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教师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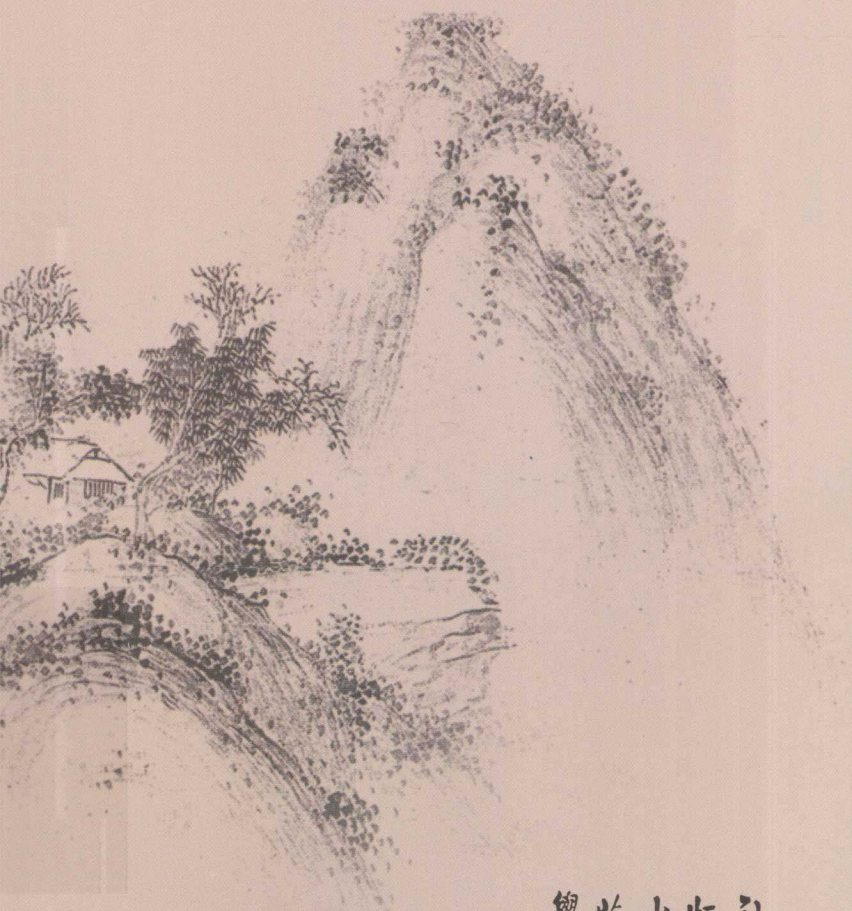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史学三题

刘永祥 著

历史编纂学的转型

『新史学』的演进

经史关系的变迁



學苑出版社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教师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民国时期史学三题

刘永祥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时期史学三题 / 刘永祥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077-4794-2

I. ①民… II. ①刘…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K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4296号

责任编辑: 郑泽英

封面设计: 陈四雄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 010-67601101 (销售部)、67603091 (总编室)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本尺寸: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31.00元

卷首识语

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的转型，是近些年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不少成果。本书遵循“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原则，围绕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的专题展开探讨，共分为上、中、下三篇。兹先简要陈述基本观点，以与正文形成呼应。

上篇：历史编纂学的转型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史学是以历史编纂学为主体的，一切理论的阐发、事实的考辨、价值的传播等，皆以此为载体或归宿。纂修一部流芳百世的鸿篇巨制（或官修、或私修；或个人、或集体），几乎是所有史家的崇高目标，即使是在考史较为兴盛的时期，也基本围绕正史展开，修史仍被视为史学正宗。可以说，自汉至清的历史编纂学，基本形成较为统一的体系，并作为史学的主体象征、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以及农耕文明、君主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近代以来，中西两大文明体系之间的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中华文明作为劣势一方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社会结构转型的序幕随之拉开。在这一过程中，晚清士人经历了由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的心路历程，而当西学彻底占据文化优势后，传统文化也就面临解体的危险而被迫转型，史学则进一步脱离经学束缚并充当急先锋角色，经过六十年的积累，至20世纪初开始发生带有整体性的转移，试图建立与西方现代史学相接轨的新典范。这一趋势，反映到历史编纂学领域，在晚清时期表现为世界意识和近代意识的增强，至20世纪初则引起编纂体系的根本变化，从理论、思想到内容、范围，从形式、方法到目的、受众以及传播方式等，无一不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以西方现代史学为参照的20世纪中国史学，实际旨在走出以历史编纂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以叙事为中心），进而建立以历史研究为主体的现代史学（以问题为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历史编纂学确实经历了一个解体与重构的艰难过程。史学理论体系的重建与现代学术机制的逐步形成，尤其是史学的学院化、职业化、独立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出版、期刊的迅猛发展，不仅终结了历史编纂学在史学中的主体地位，并且重新整合了其体系。在这一蜕变过程中，传统历史编纂学并未坐以待毙，而是主动进行自我调适，从而使数千年形成的优良传统融入新潮流之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故此，中国史学实际逐渐步入了“后历史编纂学时代”。

近代历史编纂学的发生及发展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乃是在时代前进、社会转型以及史学演变的多重推动下，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蜕变过程。大致说来，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自鸦片战争爆发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西文化碰撞及经世思潮下历史编纂学突破传统格局的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为世界意识和近代意识的滋生和强化。以

“考史”反动面相出现的“著史”，成为发挥史学“重新认识世界”和“实现救亡图强”功能的主要媒介，世界史、当代史与边疆史编纂异军突起，有关历史变易、民族观念以及国家疆域等的新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贯彻，而经过创新后的典志体则成为容纳新内容、传播新知识的流行体裁。第二阶段，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五四”前后，是传统历史编纂学解体、近代历史编纂学体系初步建立，即以封建皇朝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向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过渡的时期。传统历史编纂学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正史，遭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家的猛烈攻击，以西方现代史学为参照的“新史学”借助历史教科书编纂，主导了一场以进化史观、民族主义、整体视野、民史书写、史论结合等为基本特征的“国史重写”运动，进而引发历史编纂学从目的到理论、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叙事的全面变革。第三阶段，自“五四”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是近代历史编纂学形成多元互涉格局的时期。一方面，西方史学理论的大量输入以及科际整合的治史取向，缔造了历史编纂指导思想和方法的多样化图景；另一方面，日本侵略引发的民族危机推动了通史编纂的高涨，分科意识的上升促成了专史书写的兴起，而历史编纂的社会化、世界化以及史书体裁的综合化趋势亦渐次凸显出来。

中篇：“新史学”的演进

由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以鲜明的立场对两千年旧史展开激烈批判，以明确的论点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即：主张在史观统摄下解释历史，并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坚持“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主张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并讲求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以“民史”取代“君史”；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倡导跨学科的治史方法等，初步建构起与西方现代史学相接轨的理论范式。以往，一般将其兴起和存在限定于20世纪初至“五四”前后这一时间段，“五四”以后则多关注新历史考证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塑造出起伏状的史学构图，似乎新史学已衍化或消弭于后二者之中。事实上，“五四”以后，如何建构新的史学话语体系，如何推进史学的科学化，成为中国史家的共有目标和学术自觉，而主要存在三大路径：一是，沿着新史学所开创的史学范式继续拓展、深化；二是，本着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致力于考证历史真相；三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

新史学在民国时期的演进，首先表现在梁启超对原有史学体系的完善和深化，如对史料搜集、鉴别、考证的详细阐述，对进化史观和因果关系的修正，对史学功能的重新认识等。其次，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取得卓著成绩，如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杨鸿烈、周予同、周谷城、陆懋德、卫聚贤等。他们在思想渊源和研究领域方面颇为多元，但在史学宗旨上极为相近，均属新史学一脉，并大都受到梁启超的学术影响。就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新史学无疑为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不仅大致扫清了可能来自传统史学的障碍，而且成为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新”的重要条件，同时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培育了适宜的学术思想土壤。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的区别较为明显，而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大的学术取向

上保持一致，都以历史解释、史学致用、社会视野、科际整合以及历史编纂为主要元素，但二者之间又存在根本性差异，尤其在史观方面，前者始终未能跳出唯心的窠臼，逐渐走向相对主义，况且后者除在科学性上整整高出一个层次外，还具有极其鲜明的革命性。故而，以三大干流来概括民国时期史学的基本格局应更为妥当。当然，三者并非截然分途，而是紧密交织，共同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

下篇：经史关系的变迁

经学在古代两千余年学术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史学亦为传统学术中之荧荧大者，二者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无穷智慧，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大笔丰厚文化遗产。对这两大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可以有诸多视角，而对经史关系的历史考察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命题。经史关系的演变，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演进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了复杂而各具时代特色的演进路径。大致来说，先秦时期，“史在经前”、“经史一体”。就起源而言，“史”的出现较“经”为早，而这一时期，经与史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仍处于经史一体的阶段。两汉时期，“史附于经”。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居于主导地位，史学依附于经学，尚未完全独立出来，此观《汉书·艺文志》将史著附于《春秋》即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经史分途”、“经前史后”。这一时期，史著大量增多，史学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并仅次于经学。宋明时期，“经精史粗”、“经尊史卑”。经学在这一时期由于理学的发展而显示出更强的义理和思辨色彩，相较而言，史学则处于较卑微的地位，学者以尊经为高尚事业而视史学为玩物丧志。清代，“史学上升”、“经史平等”。章学诚对“六经皆史”进行系统的理论阐发，客观上大大抬高了史学地位；康有为大倡孔子改制在客观上将孔子与诸子平列；章太炎则继承并重新解释“六经皆史”。经学独尊地位逐渐被打破，史学地位逐渐上升。

民国以后，经史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晚清科举制的废除、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与民主共和的勃兴，使经学逐渐丧失了其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制度和权力基础；同时，西学的不断输入为中国学术带来新鲜活力，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最终取代经学先后占据学术指导思想地位，经学时代就此终结。相较而言，史学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却成为几乎可以囊括一切学术的学科，成为盛极一时的显学。在亘古未有的时代背景下，经史关系呈现出与以往根本不同的全新格局。有学者将此时期经史关系归结为经学逐渐边缘化，而史学走向学术中心。粗看来，似乎颇有道理且十分形象，细究之，就会发现，这一描述事实上并未能真正把握20世纪中国学术的演进脉络。这种提法，将经学与史学截然分为两途，似乎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化仅仅是学术地位的变更，而事实的发展却并非如此单线条。步入民国以来，延续传统注疏式经学研究模式甚至严守经学门户者依然存在，他们确实被边缘化，但这已然不是经学研究的主流，经学研究的主体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即由原来的经师变为学者、史家。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重新审查一切古代典籍，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的理性追求构建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时代潮流下，经学研究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理念和方法等都发生了典范转移。经典不再被顶礼膜拜，而作为研治历史的资料或历史研究的对象。学者以平等的眼光将经典视为史料，不仅以科学的方法对经典本身加

以审查，而且以此来探究古代社会情形；同时，又以史家的责任感对这份庞大的文化遗产尝试加以清理，系统考察经学自身的形成、演进历程以及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内在关联；此外，还有学者积极挖掘儒家经学的思想价值。由此，经学被纳入到史学研究范畴，经史关系形成全新格局，即“贯通经史”、“以史治经”。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陈其泰先生、王育济先生、田海林先生等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此外，瞿林东先生、张越先生、罗炳良先生、赵兴胜先生等也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谷雨先生为此付出了诸多努力，学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也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从事本书编校工作。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存在的错误、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刘永祥

写于2015年1月

目 录

上 篇 历史编纂学的转型

第一章 清遗老的精神寄托：清史馆与《清史稿》的纂修 / 2

第一节 复古思潮与清史馆之设 / 2

第二节 《清史稿》的编纂过程 / 4

第三节 清遗老政治文化心态的真实写照 / 6

第二章 国家意志在修史领域的弱化：民国国史馆的多舛命运（1912—1949）/ 9

第一节 新旧交织：国史馆初设无功（1912—1917）/ 9

第二节 政学转换：国史馆降格为国史编纂处（1917—1927）/ 12

第三节 筹而未设：停留在政策层面的国史馆（1927—1937）/ 15

第四节 保存史料：战火淬炼下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1937—1946）/ 18

第五节 复古“正统”：国史馆政治属性的强化（1946—1949）/ 22

第三章 “历史完形论”的提出与实践：周谷城的中外通史编纂 / 26

第一节 以“新史学”为主旨的通史编纂理论 / 26

第二节 以新纪事本末体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 / 28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借鉴 / 31

第四节 历史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 / 33

第四章 吕思勉与历史编纂的新探索 / 36

第一节 《白话本国史》：开创中国通史编纂的新纪元 / 37

第二节 《吕著中国通史》：通史编纂的全新尝试 / 42

第三节 通史编纂经验在断代史中的成功运用 / 46

中 篇 “新史学”的演进

第一章 重写20世纪史学史的思考：以“新史学”的传承和发展为例 / 52

第一节 对梁启超史学前后期关系的重新界定 / 52

第二节 新史学从思潮向流派的转型 / 55

第三节 新史学流派的学术主旨 / 58

第二章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 62

第一节 “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 / 62

第二节 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 / 64

第三节 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 / 68

第三章 唯物史观与“新史学”学者治史的新境界 / 71

第一节 “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批评 / 71

第二节 唯物史观与“新史学”理论的深化 / 74

第三节 诸多领域的启发性运用 / 77

第四章 “五四”以后“新史学”的延续：萧一山的史学思想及清史编纂新论 / 81

第一节 深厚的师生情谊与博通的治史风格 / 81

第二节 中西交融下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 84

第三节 “以义为全书之精神所在” / 87

第四节 政治、经济、文化均衡论叙 / 89

第五节 运用章节体编纂大型史书的成功范例 / 91

第五章 卫聚贤与“新史学” / 95

第一节 鲜明的进化史观和强烈的经世色彩 / 95

第二节 跨学科治史方法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 99

第三节 对中国史学史的较早探索 / 103

第六章 陆懋德《中国史学史》的特点和价值 / 109

第一节 两份目录之差异 / 109

第二节 以史书编纂为主线梳理中国史学的演进脉络 / 111

第三节 中西史学比较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 114

下 篇 经史关系的变迁

第一章 谢无量经学思想略论 / 119

第一节 以现代哲学、文学理念统摄经学的尝试 / 119

第二节 融经入史：开拓经典研究的新方法 / 123

第三节 浓郁的“信古”风格 / 128

第二章 以史治经：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 /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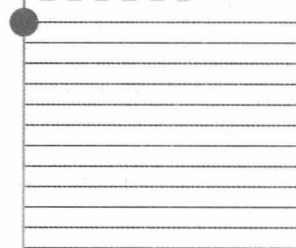
第一节 以史学治经学，以史学统一经学 / 131

第二节 以进化论为指导、注重因果与联系的治史特色 / 136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达到学术研究新境界 / 145

上 篇

历史编纂学的转型



第一章 清遗老的精神寄托： 清史馆与《清史稿》的纂修

第一节 复古思潮与清史馆之设

易代修史，是中国古代优良的史学和文化传统，尤其自唐代设馆修史制度化后更成为一种惯例，与国史纂修共同构成官方史学的基本格局。新生的民国同样延续了这一传统，单独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其设立承载了更多的政治意图，作为民初复古思潮的组成部分而存在。

袁世凯当政后，试图恢复帝制，并实施了一系列带有复古意味的举措，时人曾将1914年称为“复活年”：“去年中华民国之历史，可一言以蔽之，曰复活。科举死久矣，去年乃有考试知事之举，是科举复活也。相国之在清朝，固已同日湮逝矣，而东海为国务卿，则有相国之称，是相国复活也……他如祭天祀孔之典礼、老爷大人之名称，无不同复活。”^①拉拢前清旧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为消除遗老们对于出仕民国的“贰臣”心理，袁世凯设立了许多名誉机关如礼制馆、国学馆、考文苑等，清史馆亦为其中之一，事实上，这是设馆的主要原因。^②

1914年1月，在袁世凯授意下，有关熊希龄拟请设立清史馆的新闻开始见诸报端，并称：“中华民国追维让德于大清皇室，特颁优待条文，崇德报功，无微不至。”^③同年2月3日，国务院向大总统提出正式呈请，指出：

凡新陈之递嬗，每纪录而成编……盖时有盛衰，制多兴革，不有鸿篇巨制，将奚以窥前代之盛，备后世考镜之资。况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粲然，治具咸飭……惟是先朝纪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尤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兹经国务会议议决，应请特设清史馆，由大总统延聘

① 觉迷：《中华民国之去年》，《大公报》1915年1月5日。溥仪也曾回忆称：“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等等举动，令人眼花缭乱。”（《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同样将清史馆的设置视为复古活动之一种。

② 当时，《时报》曾刊发《清史馆组织之丛谈》（1914年6月15日）一文，称：“此次参政任命发表，就中辞职最力者为劳乃宣、于式枚二氏，大总统以二君品学兼优……又以二氏不愿就参政者……于是拟别设清高之职以示尊礼之意，故急于组织清史馆，以便延聘劳、于二氏云。”

③ 《熊总理拟请设清史馆》，《盛京时报》1914年1月31日。

专员，分任编纂，总期元丰史院，肇启宏规，贞观遗风，备登实录，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于无穷。^①

呈文虽将接续易代修史传统列为首要理由，但其核心要旨仍在于对清代文治武功的褒扬，以及将民国的创建视为清廷“让德”的结果。这一对两者关系的定位，显然与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及后来的国民政府截然异趣，实际反映出袁氏政府对“正统”的变相追求。

同时，北京政府国务院迅速拟订出《清史馆官制草案》，规划了史馆的地位、职责和人员构成等：“清史馆掌纂辑清史并储藏关于清史之一切材料……清史馆置官员如左：总裁（特任）、秘书（荐任）、纂修（同上）、协修（同上）、主事（委任）……总裁一人掌全馆事务，直隶于大总统。”^②1914年3月9日，袁世凯正式颁发大总统令：“查往代述作，咸著史篇，盖将以识兴革之所由，资法鉴于来叶，意至善也……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③由所谓“广召耆儒”、“延聘通儒”、“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以及官制草案可知，袁世凯对纂修人员、史书形制和史馆定位等已有较为清晰的角色期待，显然意在消弭遗老对新政权的排斥感。设馆命令颁布后，当局面临的首要任务为纂修人员的延聘，尤其需要确定馆长人选。据当时报纸报道，徐世昌、陆润庠、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樊增祥、周馥等皆曾进入当局视野^④，只是由于种种顾虑或复杂关系均未出任。在颇费一番周折后，以遗老自居的赵尔巽终于同意担任清史馆馆长，并“要求政府对于清史馆之用人及编纂问题均不得干涉”^⑤，清史馆遂正式成立，馆址位于故宫东华门内，原为清国史馆、会典馆馆址。

应该说，袁世凯在筹设清史馆时的苦心积虑与赵尔巽的最终出山，在前清遗老中间引起不小震动，“有主张修史者，有以为不当修者”^⑥，如梁鼎芬就致函赵尔巽直言：“国号虽更，少帝尚在，当此时代，公然编纂清史，对于现今幼主而直书前皇之遗事，宁非不敬之尤者耶？鄙意斯举请即中止；却为稳当。”^⑦当然，态度如此强硬的“顽固”遗老为数并不多，多数人将入馆与入仕作了性质上的区别，并不认为修史是对旧主的背叛，反而认为是特殊形式的尽忠。馆长赵尔巽就曾为自己辩解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⑧舆论亦称其“自民国成立后，本无意于仕途，此次之出任清史馆长，

①《政府公报》第628号，1914年2月5日。

②《清史馆官制》，《申报》1914年2月9日。

③《政府公报》第660号，1914年3月10日。

④参见《清廷编订清史》（《大公报》1914年2月1日）、《康有为允任修史之传闻》（《大公报》1914年2月8日）、《睇向斋逞臆谈·康有为、梁启超》（陈瀛一：《睇向斋秘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政府确将开清史馆》（《申报》1914年1月29日）、《重要机关之重要人物未确定》（《顺天时报》1914年3月13日）等当时相关新闻报道。

⑤《清史馆消息三则》，《时报》1914年7月8日。

⑥王钟翰：《张尔田师谈〈清史稿〉纂修之经过》，《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⑦《梁鼎芬之直言》，《顺天时报》，1914年7月16日。

⑧溥仪：《我的前半生》，第90页。

且意欲编纂一至完全之清史，以尽其耿耿之心”^①。再如，张尔田在解释其师章钰何以入清史馆时指出：“辛亥国变，弃官从好，旅食于京沽间。先生自以对于国事无所裨，而文献之寄不可以无传，故即以读书报三百年养士之泽。”^②颇能反映遗老对待清史纂修的态度。

就任后，赵尔巽成立了清史馆临时筹备处，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标准筹建修史队伍，要求“必须由翰林苑起家，学问渊博，掌故熟悉，或精通满蒙藏各文者方为合格”，而应者众多，“连日门前车马络绎，冠盖如云，前后求见者约达一千余人之数”。^③清遗老多成名于光、宣年间，并在政坛和学坛身居要位，而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其生存空间，不仅丧失了政治职权，而且不少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清史馆的设立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秉笔直书、青史留名的路径，并借此寻回故朝记忆，缓解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冲击，更能改善生活境况，而袁世凯对民国与清朝关系的定位又大大减轻了被视为“贰臣”的心理负担。在赵尔巽的主导下，先后被聘入馆的总纂、纂修、协修共100多人，“十九清之达官”^④，实际以遗老为主体。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虽在政治立场上多不忘旧主，但并不能就此给其烙上“守旧”的印记，实则他们属于过渡期的知识群体，具有思想上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而这一特点亦反映到《清史稿》的编纂中。

第二节 《清史稿》的编纂过程

纂修队伍初步组建后，清史馆开始正式运转，而体裁、体例的确立是第一步工作，这是历代官方修史的传统，因为采用何种编纂形式并非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制约内容的安置，实际上直观反映了再现客观历史的路径和方式，同时又与正统论、春秋笔法、笔削标准、是非判定、价值取向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民国取代清朝又在性质上有别于以往的王朝更迭，故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本应充满新旧思想的交锋。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民主共和进程，而清史馆的设置又是其中重要环节，袁甚至在设馆命令中已经作出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表述，因此有关清史编纂的体裁并未经过大的讨论就达成一致，差异仅在于具体体例的确定方面。

当时，清史馆就体裁、体例问题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馆内外学人（以馆内纂修人员居多）纷纷就某一方面建言，比如于式枚等撰《拟开馆办法九条》、梁启超撰《清史商例》、吴廷燮撰《清史商例》、金兆蕃撰《拟修清史略例》、张宗祥撰《陈纂修清史管见数则》、朱希祖撰《清史宜先修志表而后纪传议》等。多数认为清史“为结束二十四史之史，清史以后体例如何，自当别议”，但清史乃“与二十四正史并列之书，实在矣数千年

①《清史馆消息三则》，《时报》1914年7月8日。

②张尔田：《先师章式之先生传》，《逊庵文集》卷二，1948年铅印本。

③《赵次珊到京后之情形》，《盛京时报》，1914年6月9日。

④柳诒徵：《清史刍议》，《史地学报》1921年第1卷第12号。另，李思清曾在《舫斋载笔：清史馆文人群体的形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卷第4期）一文中对清史馆的馆员构成及其特点加以详细考证和阐述，读者可以参考。

帝制结局之作”，故而主张沿用纪传体，并在类目上“大体近法《明史》，而稍有变通”。纪传体并非单一体裁，而是带有综合性质，能够容纳丰富的史实，从不同层面反映历史演进情形，但同时也是君主专制制度在史书体裁上的映射。其时，“新史学”已风靡全国，以章节体为主的新式体裁已颇为流行，对旧式体裁的改造也方兴未艾，但以遗老为主体的清史馆显然未能表现出足够的求新意识，而是恪守传统，致使不少具有创新价值、反映时代进步的看法被有意忽略了。比如，有人提出志、传应添加图，认为：“旧史无附图者，近代舆图，日以精密，工技之精，非图未辨，左图右史，古学所重，大约疆理、河渠、邮传之志，礼器之数，兵之船械，皆非有图，无以证明……既无因袭，亦可特创。”有人建议增加民俗志，认为：

志宜兼详民事。中国旧史，大都详朝廷制度，略民间礼俗，《史记》独多言民事，千古称之，今宜扩而充之。凡民间礼俗之大，居处饮食之细，及一切日用风教有关者，良窳得失，灿然无遗。^①

此类意见虽不占多数，但毕竟说明新的科学精神和史学理念已开始向官方修史领域渗透。

修史机构能否有序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然而，清史馆开馆之初，馆长赵尔巽并未制定详细的工作条例，仅设置总纂诸员分撰表和功课簿，依据馆员专长而分配任务，要求馆员每两个月到馆交稿一次。由于秉承袁世凯羁縻“遗贤”的宗旨，上述考核制度多流为形式，并不具有实质上的约束作用。严格的监督和审查机制的缺失致使史馆组织涣散，出现许多“领执笔名义者、坐领厚薪者、饱食而嬉者”^②，他们“每天聚着谈谈，随便撰写一些，全无条例，有如一盘散沙”^③，甚至出现“有请人代撰者，其代撰之人，更不知学术”^④的荒诞现象，因此最初几年虽成稿数量众多，纪、传、表、志等均粗具初稿，但质量参差不齐。对此，朱孔彰曾建议对“全史体例加以审正，而慎选总领之人，商定分纂之办法，庶不致紊乱无纪，冀可观成”^⑤，惜未被采纳。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军阀割据、混战渐次粉墨登场，在动荡的局势下，清史馆因丧失政治象征意义而被新政权体系迅速边缘化，最直观的表现就在于经费的骤减：“馆中经费骤减十万，其后递减，月至三四千。此三四千者，犹不时至，或参以国库券公票之类。”馆员随之大半散去，仅余20多人。不过，政治负担的减轻以及素餐之人的离馆反而让赵尔巽能够放手整顿，他进一步统一凡例，明确分工，并特聘邵章为提调，专司其事，负责与编纂人员联系，同时整理先前已撰好的文稿，又在缪荃孙建议下制定了“以时代为段

① 朱师辙：《清史述闻》，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206、4、170、206页。

② 徐一仕：《关于清史稿》，《逸经》1936年第6期。

③ 郑逸梅：《清娱漫笔》，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

④ 张尔田：《清史稿撰述之经过》，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5页。

⑤ 朱师辙：《清史述闻》，第46页。

落，择人分任”的统稿、审查原则，馆风遂大为改善。然而，直皖、直奉战争的爆发令东华门经常关闭，馆员无法“调书考证”，经费亦几近枯竭，“在馆人员，等于半尽义务”。^①最终馆内仅余14人，并被迫进行馆外兼职，以维持生计。无奈之下，馆长赵尔巽向吴佩孚、张宗昌等寻求支持，而“诸军帅慕义乐善，而重公之名德……皆慨输巨款”^②。

1926年，鉴于全稿已粗具规模，史馆决定用两到三年时间进行终审定稿，并重新分配任务，即：柯劭忞总阅本纪、王树枏总阅志、吴廷燮总阅表、夏孙桐与金兆蕃总阅列传等。1927年春，随着北伐军节节胜利，赵尔巽以“时势之艰虞”和“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③为由，决定将史稿付印。部分馆员对此持赞同意见，希望以刊印后的稿费补发欠薪，而夏孙桐等则极力反对，认为史稿错漏太多，“断不可冒昧行之”，否则恐贻笑世人，并建议“实事求是，逐加修正，务延总阅，全体讨论，以期详审”。^④但赵尔巽意在有生之年完成清史编纂心愿，遂坚持己见，并称：“吾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⑤不久，赵尔巽病重，适逢袁金铠来京，遂委以刊印之事，而袁又假手金梁负责。同年8月，赵尔巽病故，由柯劭忞代理馆长，并再次缩短刊印之期，造成大量书稿来不及审核、修正即付刊印。全书赶在北伐胜利之前仓促印刷完毕，计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共536卷，800余万字。当时，共印制1100部，其中400部被金梁未经馆长批准即运往关外，称为“关外本”；留在馆内的700部被馆员发现多有金梁私自增改之处（如增加康有为、张勋传，修改部分列传，删改艺文志序，增加校勘记等），遂重加纠正，称为“关内本”。后来，关外再次重印，对部分列传、史表等做了删改，称为“关外二次本”。

第三节 清遗老政治文化心态的真实写照

《清史稿》的编纂自1914至1928年历时14年，处于北京政府时期，而无论是袁世凯、徐世昌，还是段祺瑞，虽重视程度有别，财政支持有异，但都为清史馆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官方与史馆基本处于游离状态，馆员们具有较大的历史书写自由，从形式的选定到内容的取舍，均取决于其主观裁决，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官方的严格监督与有意干预，而这在以往的易代修史中几乎不可想象。上述现象的出现，既与当权者对民国与清朝关系的定位密切相联，又因史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丧失了原有的政治威力，而时局的动荡更令当权者无暇顾及于此。

《清史稿》的纂修背后缺乏强有力的政权支撑，而人员较为混杂，历史观念有别、学术水平有异、用力程度亦不同，加之最后的审阅工作过于仓促，因此与传统官修史书相较

① 朱师辙：《清史述闻》，第58、75页。

② 徐一仕：《清史稿与赵尔巽》，《逸经》1936年第2期。

③ 赵尔巽：《清史稿发刊缀词》，《逸经》1936年第5期。

④ 朱师辙：《清史述闻》，第184页。

⑤ 爽良：《清史馆馆长前东三省总督盛京将军赵公行状》，载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在统一性方面有所欠缺，尤其表现在体例不合、内容抵牾等方面，但由于纂修人员以前清遗老为主，与以往站在新朝立场书写旧朝史颇为不同，故而在政治立场或思想倾向上又表现出高度一致，并充分折射出遗老在面对政权更迭和社会转型时的复杂心态，尤其表现在对待辛亥革命和西方入侵的态度等方面。

前清遗老们基本遵循“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的编纂原则，内清室而外民国的倾向亦较为明显。对于清代皇帝，极尽歌颂之能事；对于民族压迫，则极力回护。尤其是，对于直接导致清朝覆亡的辛亥革命及革命党人的事迹，《清史稿》少有记载或语含贬抑。比如，关于武昌起义，史稿记载称：“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乙卯，武昌新军变附于革命党……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①相反，对于端方、赵尔丰等对抗革命者则多有立传，并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②。其他如使用干支纪年而不用民国纪年，有意不书孙文之名，将梁济、王国维载入《忠义传》等皆说明，清史馆虽属于民国时期的政府机构，但纂修人员却大多站在清朝立场上进行历史叙述。这正是《清史稿》后来被南京政府查禁的主要原因。

1928年6月，清史馆被故宫博物院接收，《清史稿》随即被封存。同年10月，刘赞廷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将《清史稿》启封发售，以“供诸民众，共见共闻，俾得详尽之批评，以便正确之修订”^③。1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建议行政院禁止《清史稿》发行，认为：

（《清史稿》）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④

并指出其存在的19项错误，而前六项为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以及反对汉族等，其余则为体例或史实方面的问题。随后，《清史稿》被当局查禁。《清史稿》在民国前后期的不同遭遇，实则是政治理念转换的必然结果，北京政府意在维持皇权正统，而南京政府则标榜民主共和，革命与忠君的观念再度发生碰撞，设馆延聘前清遗老纂修清史的法理依据已然丧失，而立场的转换使得《清史稿》的正当性不复存在，故难逃被查禁的命运，这也说明官方修史的政治属性要强于文化属性。

对于这一问题，孟森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应区别“表扬清室”与“触犯民国”：“在馆秉笔诸人，当时采清代旧望，来者多以元遗山自况，用修史以报故君，故疑其内清而外民国，此诚有之，但意主表扬清室，与敢于触犯民国，并非一事，其可疑与否，当据书中内容而言，不当以揣测之故，湮没甚富之史料。”事实上，在审稿总阅阶段，纂修人员确在

①《清史稿》卷二五“宣统皇帝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6页。

②《清史稿》卷四六九“恩铭”，第12790页。

③许师慎：《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223页。

④易培基：《故宫博物院请行政院禁止发行呈文》，《华北日报》1929年12月24日。